

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 九七前後的轉變

• 鄭宏泰、黃紹倫

引言

長久以來，身份認同的問題一直困擾着大部分香港華人。每當遇上國家大事，如「釣魚台事件」、八九天安門事件、北京申辦奧運等時刻，他們會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a part of China)，香港華人自然是中國人；但當涉及到另外一些情況，如香港推行的資本主義制度、民主人權等，他們又自覺和大陸有別 (apart from China)，認為自己是香港人^①。這種身份認同上的左搖右擺，心理和認知上的模稜兩可，恰好反映香港華人所處之境地、所經歷的歷史，亦是他們能夠在高度競爭多變的商業世界下 (以西方文化為主導) 適應下來，並發揮其所長的特徵。

身份複雜

正如科大衛 (David Faure) 所言^②，香港是中國的一個沿海城市，也是一個由華人組成的城市，一個大都會。除此之外，她也是一個殖民地。香港人在身份認同上的含糊不清，是根源於英國殖民統治。1842年清政府屈從於英國的堅船利炮，割地賠款，揭開了香港這個寂寂無聞的小漁港的歷史。英政府管治東南亞殖民時都盡量保留當地文化與傳統，對香港亦不例外^③。在這個九成以上人口為華人的殖民地，中華文化大體上受到保障。從一夫多妻制、男人可以立妾的傳統要到1972年才正式被廢止這一例子中，可以窺見英政府「文化不干預政策」的一鱗半爪。當然，仍有香港華人

長久以來，身份認同一直困擾着大部分的香港華人。每當遇上國家大事，他們會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但當涉及到另外一些情況，他們又自覺和大陸有別，認為自己是香港人。這種身份認同上的左搖右擺，心理和認知上的模稜兩可，恰好反映香港華人所處之境地、所經歷的歷史。

* 從1988年起，在大學研究資助局 (University Research Grants Council) 的資助下，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攜手合作，每兩年一次進行全港性的社會指標調查，藉以了解香港社會的發展情況。本文有關資料，便取自歷屆 (1988-2001) 的調查結果，謹此致謝。由於篇幅有限，本文的相關圖、表在此略去，讀者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或參閱《二十一世紀》網絡月刊的全文。

本文曾於2002年5月在台北和高雄舉行的研討會上發表，並獲與會者不少寶貴意見、批評和指正，在此也必須致以謝忱；參與研討會的經費，得到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香港文化與社會」研究計劃資助，亦一併致謝。

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動盪，在一浪浪的災難中，大量難民從大陸湧入香港。戰後香港人口約為50萬，到了1953年已升至250萬。短短八年間，人口增加了200萬。當時每五人中便有四人為該時期來港的難民移民。由此可見，香港是一個由華人難民組成的殖民地城市。

不滿受「異族」統治，以鮮血對抗港英政府的事件發生^④，但大致上，港英政府的「懷柔」政策已大大消弭了華人的對抗心理。隨着經濟的發展、教育、傳媒和政府政策等的潛移默化，「殖民統治」的形象也日漸淡化^⑤，香港華人在身份上已出現殖民地下的「順民」和「炎黃子孫」的雙重身份了。

香港華人身份的含糊與難民心態 (refugee mentality) 亦有重要關係。二十世紀的中國是個多災多難、政治動盪的國家，滿清皇朝分崩離析，國家社會動亂不安，中華民國的成立、軍閥割據、日本入侵均是一場又一場的災難洗禮。二次大戰的結束仍不能為中國帶來和平、安樂。國共內戰後，國民黨敗走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終於結束了半世紀以來的亂局。但大亂過後並未帶來大治，反而迎來三反五反、大躍進、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等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整肅運動，中國人民還要飽受社會動盪不安的煎熬。面對國家千瘡百孔，一窮二白，鄧小平提出經濟改革時說得很有神髓，也把握了實情：「不開放改革便有死路一條」。結果在世紀末中國的大門終於敞開，中國人民也真正可以面向世界，初嚐災劫過後的和平和機遇。

在一浪浪的災難中，大量難民從大陸——尤以沿海及廣東一帶為甚——湧入香港。戰後香港人口約為50萬，1947年跳至180萬，其中單是1949-50年一年內便有約776,000難民流入香港^⑥，到了1953年，人口已升至250萬。短短八年間，人口增加了200萬。換言之，當時每五人中便有四人為該時期來港的難民移民。按林潔珍與廖柏偉的統計^⑦，在1961年，全港人口為3,168,100人，其中50.5%生於中國，47.7%生於香港，1.8%生於其他地方，以此計算，當時有超過

一半是移民人口 (52.3%)。俟後，移民仍不斷湧入。直至1980年10月24日港府實施「抵壘政策」(reached base policy)，非法移民潮才受到控制^⑧。由此可見，香港是一個由華人難民組成的殖民地城市。

移民初期，大部分人都沒有把香港當作「落地生根」的地方，因此在身份認同上仍以中國人或祖籍／出生地為主。就連香港初期的人口普查，也只是以市民的「籍貫」，而非後來的「出生地」為主要分類。其後憑着個人吃苦耐勞，香港華人開始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與此同時，大陸同胞卻活在貧窮當中，因此香港華人的難民心態漸減。明顯地，他們對香港「日久生情」，對「香港人」的身份亦由疏離變為接受及產生認同，這感情發展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由於難民心態仍有很大的影響力，這時期的香港人在接受新身份的時，仍有以「中國人」自居的。

1960、7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土生土長的一群也同時冒起。與難民一代最明顯不同，新一代生長於斯，共同在學校接受教育，在政府提供的屋村球場上留下汗水，在家中收看免費的電視娛樂，「這種共存 (co-presence) 和團體的感覺……確立了 (香港人) 自己的身份，並且在彼 (中國人) 此 (香港人) 之間劃上清晰的界線。」^⑨毫無疑問，香港戰後成長的一代，無論生活、工作、娛樂、消閒各方面都相近，對建立香港的自我身份認同有直接影響。而新生代對中國既無所知，亦無所感，加上媒體對大陸同胞負面的描述，如電視劇中土裏土氣的「阿燦」、「表叔」，電影中兇狠殘暴的「旗兵」、「大圈」等角色定形，反而加強了他們對中國的抗拒。因此，在身份認同上，新一代較認同自己為「香港人」，而非「中國人」^⑩。

政治因素也令香港華人身份更形複雜。50、60年代抵港的難民當中，不乏親國民黨人士，他們不認同共產黨政權，然而又不能否定共產黨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的事實，對他們而言，「中國人」的概念更加複雜^①。殖民地政府有系統地除去民族認同感(de-ethnicization)過程的「非中國化」政策，也減弱了香港華人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②。在香港，無論是教育、政府政策、宣傳等，均「淡化」中國因素，以減低大陸對香港華人的衝擊。

香港華人生活在殖民地資本主義制度下，亦嗜到這種制度的甜頭，對共產政權或多或少抱有畏懼或「敬而遠之」的心態^③。就算對中華文化有認同，在理解自我身份時，仍在「中國人」、「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等概念上糾纏不清，正如前新華社駐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指出^④，大部分香港人都覺得自己愛國，但他們所愛的國家和大陸所指的不同，他們愛的是「中華民族」。相對而言，「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則比較清晰直接。

「中國人」和「香港人」的定義

隨着1997年主權回歸與殖民地色彩的退卻，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理論上應該比較明確了，然而，實際上這問題仍困擾着不少香港華人。下文我們嘗試探討九七前後「中國人」及「香港人」對香港的歸屬感、對前途的信心、對中國政府及香港政府的信任度，以及他們如何理解香港的政治、經濟和法律狀況，從中剖析身份認同上的差異及箇中因由。

劉兆佳在〈「香港人」或「中國人」：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1985-1995〉一文

中指出：「香港華人普遍使用『香港人』及『中國人』兩個詞（語）來指謂自己……『香港人』及『中國人』乃是香港華人感到最有意義的兩種身份。」^⑤。為了方便分析，本文採用劉氏對香港華人身份認同的較為簡單的分析界定方法，即是如果受訪者的自我身份認同為「香港人」，便簡稱「香港人」；認同自我身份為「中國人」的，則簡稱「中國人」；而認為自己身份既是「中國人」又是「香港人」的，則簡稱「兩者皆是」；反之，認為自己既不是「中國人」又不是「香港人」的，為「兩者皆非」，他們可能有外國國籍，因而認為不是「中國人」或「香港人」。在此我們必須指出，本文所指的「香港人」或「中國人」概念，只是指受訪者本身的主觀感受而已，並非學術界的定義或內涵。另一方面，也希望藉着此文回應劉氏的文章，補充回歸之後香港人在身份認同上的一些轉變。

「中國人」和「香港人」的特徵

如前述，導致香港華人在身份認同上出現分歧和含糊，是難民心態和新一代成長歷程不同等因素交織而成的。調查資料的分析恰好印證這一說法。（一）「香港人」身份漸有減少，「中國人」身份變化不大，1999年起則慢慢冒升。1990年的調查顯示，有近60%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約為25%；到了2001年，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減至50%，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則增至30%。

（二）認為自己「兩者皆是」（既是「中國人」又是「香港人」）的比例也日趨上升。1990年時，不足15%受訪者認為自己「兩者都是」，到了2001年，比

香港華人生活在殖民地資本主義制度下，對共產政權或多或少抱有畏懼或「敬而遠之」的心態。大部分香港人都覺得自己愛國，但他們所愛的國家和大陸所指的不同，他們愛的是「中華民族」。相對而言，「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則比較清晰直接。

1997年香港主權的回歸，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有很大衝擊。香港回歸問題被提升為國際事件，引起全世界關注。大部分香港市民對自己「香港人的身份」增添了一份自豪感，我們稱這種現象為「九七效應」。1997年的調查中，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比率明顯上升，便是這種效應的影響。

率已增至20%。這趨勢反映部受訪者對自己的身份出現遲疑不決、比較含糊的情況。其次，「兩者皆是」這種較為搖擺和騎牆的立場，可能是香港歷史的產物，是由殖民地走向回歸祖國的一種「身份過渡」。

(三) 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有很大衝擊。香港回歸問題被提升為國際事件，引起全世界關注，國際媒體報導頻頻。中、英兩國也在回歸的日子放下爭拗，為香港製造和平穩定、歌舞昇平的氣氛。大部分香港市民感到與有榮焉，對自己「香港人的身份」也增添了一份自豪感，我們稱這種現象為「九七效應」。1997年的調查中，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比率明顯上升，便是這種效應的影響。下文我們嘗試從受訪者的出生地、年齡、教育水平和居港年份，深入剖析他們在身份認同上的變化。

首先，從被訪者的出生地中，我們發現「香港出生」的受訪者，有60-70%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不足20%。從1990-2001年的趨勢上看，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除1997年的特殊轉變時刻外)，大體上正在減少，而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則在慢慢上升。香港以外地方出生的受訪者(主要是中國出生)，則較多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為數亦不少，但比率遠不如香港出生的受訪者般「壁壘分明」。但無論是「香港出生」或「外地出生」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比率亦在下降中：例如在1990年，有39.7%受訪者覺得自己是「香港人」，1992年略降至37.9%，95、97及99年分別為37.4%、36.9%及36.6%。似乎香港華人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比率正在減少，而「中國人」的身份則日漸獲得認同。這一點與王家英認為「香港人」的

身份認同較強，而中國人民族認同顯著弱化的研究結果^⑩，有一定程度的出入；亦與梁伯華^⑪認為「香港人」身份認同正在上升的結論相反。我們的研究資料支持劉兆佳的看法：香港華人在身份認同上出現方向性轉變，「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正在下降，「中國人」和「兩者皆是」者則在上升^⑫。

不同的年齡組別對身份認同亦有明顯差異。30歲以下的受訪者接近70%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而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則在15-25%間。這分野同樣隨時間過去而有轉變迹象。在30-54歲的受訪者中，過半數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者則未超過30%。相對於較年輕的受訪者，54歲以上的一群在認同上出現灰色地帶，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和「香港人」的比率十分接近，一直在35-40%間爭逐，互有高低。這情況或反映了這組別受訪者心中的矛盾：一方面對大陸(或家鄉)存有濃厚感情，但同時對香港這地方亦日漸產生強烈的歸屬感。

為了印證「本地生」和「外地生」受訪者在身份認同上的差異，我們將「外地生」受訪者居港年期再細分，並比較他們在身份認同上的轉變。香港《人民入境條例》中的《居留權法》規定，外地合法移民連續在港居住七年以上，才可擁有香港永久居留權。我們以這一規定為分水嶺，將受訪者細分為四組：居港七年以下、7-15年、16-25年及25年以上。首先，資料顯示他們對香港歸屬感有明顯的轉變。居港年份愈長，對香港的歸屬感就愈強，這現象在歷屆調查結果都十分一致。比較突出的是，居港七年以下受訪者表示對香港的歸屬感是「少」或「很少」的，較其他三組顯著。這種情況或者正是他們的身份未獲確定的直接投射。其次，在身份認同上，絕大部分居港

七年以下者，都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而認為自己是「香港人」或「兩者皆是」的則比較接近。隨着居港年份增加，他們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比率亦漸增，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則漸減。而居港超過25年者，「中國人」和「香港人」的認同基本數量已相當接近，顯示「外地生」的受訪者已融入香港社會。

受訪者的教育程度亦影響他們對自我身份的看法。大體而言，教育程度越高，越傾向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調查發現有50-60%高學歷受訪者持這種看法；而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則佔20-30%左右。低學歷受訪者取向並不明顯，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和「香港人」的比率很接近。因年齡和教育程度上的差異而有不同的身份認同，可以理解為難民心態與本地成長一代的相互影響。上一代來港的移民大都為年長者，教育水平也較低，而年青人則多為本地出生，教育水平比較高。因此，教育程度的高低，間接反映出移民一代和本土一代心態上的差異。

從整體數據上分析，雖然「香港人」的比率正在減少，而「中國人」則在上升，我們仍不能因此簡單地推論「香港人」身份最終會被「中國人」身份所掩蓋。就算以「香港人」身份認同最低潮的2001年為例，也有接近50%的人認同自己是「香港人」，這與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30%之間，仍有相當大的差距。就算回歸四年後，香港經濟陷於困境，中國則「捷報頻頻」，國勢日強，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身份的比率仍佔主導。其次，正如前述，受訪者居港年份愈長，對香港的歸屬感和身份認同便愈大，很多「新來港移民」的身份認同，在香港本土文化的熏陶下，最終也會有所改變。因此，在現階段作出結

論，認定「香港人」身份將會給「中國人」身份所取代，是言之過早的。下文將嘗試從對香港前途的信心、對香港政經狀況的滿意度、對移民的抉擇和對中、港政府的信任四方面，剖析「香港人」和「中國人」的不同看法及態度。

對香港前途的信心

我們從調查資料中不難發現，無論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他們對香港前途的信心皆是有升有跌的。九七回歸年，人們對前途的信心最高，有50.2%的「香港人」和64.36%的「中國人」表示對香港前途有「大」或「很大」的信心。九七後則開始下降。整體上，「中國人」較「香港人」對香港前途更有信心，當中相差約有12%，在1997年及2001年的差距更大。

為甚麼身為「香港人」反而對香港前途抱持較悲觀的看法呢？這是耐人尋味的問題。較為合理的解釋或許是因為香港政治前途不確定。從1997-2001年的調查結果顯示，「中國人」比「香港人」對一國兩制中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政策落實有較大的信心。該年有51.6%的「中國人」「同意」或「很同意」中國政府已落實「港人治港」政策，而「香港人」則只有33.3%相信。到2001年，「同意」或「很同意」「港人治港」政策已充分落實的「中國人」有56.7%，而「香港人」則只有36.2%。兩者對政策能否成功推行，有近20%的差距，可見大家對香港前途和信心的分歧不小。

另一個測試「香港人」與「中國人」在前途信心上的異同，是有關他們對香港的歸屬感。整體上，「香港人」較「中國人」對香港有更大的歸屬感。這情況應該是理所當然的吧。「香港

從整體數據上分析，雖然「香港人」的比率正在減少，而「中國人」則在上升，但不能因此簡單地推論「香港人」身份最終會被「中國人」身份所掩蓋。因為受訪者居港年份愈長，對香港的歸屬感便愈大，很多「新來港移民」，在香港本土文化的熏陶下，其身份認同最終也會有所改變。

人」對香港的歸屬感在1993年的調查中，表現尤其強烈，超出「中國人」近11.9%。這是否因1991年立法局推行直選，或基於其他因素，調查資料未能顯示。到了1995年，差異略為收窄，1997年因回歸因素的刺激又再度上升。但近年隨着香港經濟表現疲弱，1999及2001年的調查結果都顯示，「香港人」和「中國人」對香港的歸屬感均在下降。

對政經狀況的滿意度

受訪者對香港政治、經濟和司法的看法有異有同，在經濟上的看法較為相似，但在政治和司法上則出現分歧。經濟方面，無論「香港人」或「中國人」都對香港的經濟表現出強烈不滿，而且每下愈況。1990年時，無論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對當時經濟狀況表示「滿意」和「很滿意」的，都有45-50%以上，1992年及1995年滿意度均在下跌，1997年一度大幅上升，可是到了1999年和2001年，比率再度下降至5-10%左右。

這情況一方面反映了香港經濟在回歸後的急劇惡化，以及受訪者對政府經濟政策的不滿。亞洲金融風暴是其中一個因素，但政府政策的失誤，如干預自由市場運作、房屋政策搖擺不定、不能迅速處理通縮及失業問題等，更加深了市民的不滿^⑨。另一方面，這也間接反映了無論是「中國人」或「香港人」，他們的經濟價值觀均比較接近。香港向來被視為經濟、商業都會，很多難民來港的主要目的，也是為了尋求更好的物質生活，因此，香港市民往往被外界扣以「經濟動物」的帽子。調查數據或隱或現地帶出了「香港人」和「中國人」共有的經濟觀念。

受訪者在經濟上較為一致的看法，並沒有在政治和司法上出現。在政治方面，「中國人」比「香港人」更為滿意香港的政治狀況。從歷屆的調查資料上可以看到，滿意香港政治狀況的「中國人」較「香港人」高出5-10%以上，其中又以1997年的差距最大。另外，九七過後，受訪者對香港政治的滿意度，有日漸上升的勢頭，這種情況或者是香港政治制度較為開放，政府的透明度也漸有增加所致。

另外，「中國人」和「香港人」對香港司法制度是否公平、公正，亦各懷己見。1997年或前期，同意香港司法制度是「公正」、「很公正」的「香港人」多於「中國人」，但比率相差不大，例如在1990年，同意此看法的「香港人」和「中國人」分別為57.5%和56.4%。但在1997年後，「香港人」對法制的公正性遠較「中國人」悲觀，差距更有擴大的趨勢，例如1997年時，「香港人」較「中國人」滿意香港的法律公正性；在1999年，此看法已有轉變。到了2001年，「香港人」對法律是否公正的信心已大幅下降，55.2%的「中國人」仍認為香港法律公平公正，而抱同樣看法的「香港人」已由高峰時的63.5%（1997年）降至51.0%。這種情況是導源於特區政府一些備受爭議的司法方針，如不起訴胡仙、人大釋法，以及律政署選擇性地起訴個別案件，例如不起訴大法官阮雲道之子等事件。

對香港政府歷年來的工作表現，「香港人」和「中國人」的看法也有出入。從資料顯示，有三點尤為突出：（一）整體而言，「中國人」較「香港人」贊同政府的表現，這情況九七前後分別不大。（二）無論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對政府工作表現的評價都越來越差，1990年兩類受訪者中，分別有20%和30%認為政府工作表現「好」或

香港向來被視為經濟、商業都會，很多難民來港的目的，也是為了更好的物質生活。1990年時，無論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對當時經濟狀況表示「滿意」和「很滿意」的，都有45-50%多，到了1999年和2001年，比率下降至5-10%左右。這間接反映了「中國人」和「香港人」兩者的經濟價值觀很接近。

「很好」，但到了2001年，均跌至只有10%左右。(三)「九七效應」相當突出。受訪者對1997年的政府表現評價甚高，分別有30%的「香港人」和35%的「中國人」認為政府表現「好」或「很好」。可惜，九七回歸後，大家對政府的評價又再回落，甚至較回歸前的殖民地政府更差。

移民外國的抉擇

移民是一個複雜而影響長遠的決定。無論是「香港人」或「中國人」，歷年資料顯示有意移民外國的比率正在下降。在1990年，有29.3%的「香港人」計劃移民外國，而「中國人」則只有約15.4%，這麼高的比率，應該是受到1989年北京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的影響。1984的《中英聯合聲明》已令香港華人感受到前途不明朗，部分有能力移民的人士已用行動表達他們對前途的不信任和恐懼。「六四事件」更激發香港華人的憂慮，移民外國、爭取外國居留權、「購買政治保險」成為部分香港華人的重要目標，這正是一度引起社會關注的「人才外流」問題^②。其後比率不斷下跌，1997年跌至低位，到了2001年，有意移民的「香港人」只有9.4%，而「中國人」則為5.5%。

從有意移民外國的比率上看，「香港人」較「中國人」為高，這與「香港人」對香港有較高歸屬感的結果相反^②。雖然打算移民離開香港的比率正在下降，但受訪者中擁有「外國居留權」的比率則在不停攀升，例如1990年大約有4.2%的「香港人」和4.7%的「中國人」擁有外國居留權，1997年分別升至7.9%和5.9%，到了2001年，比率再上升至8.7%和6.9%。同樣，擁有外國居留權的「香港人」的比例較「中國人」為

高。這種表面上看來很矛盾的數據，其實正好反映出有受訪者取得外國居留權後，回流香港生活及工作的情況正在增加。奇怪的是，「九七效應」對受訪者的移民計劃並沒有顯著影響。或者我們可以這樣理解，若香港華人會因九七回歸問題而決定移民，相信他們一早已作出安排，到1997年時，「消息已被消化」，事實上亦來不及了，因此效應不彰。

對中港政府的信任度

「香港人」和「中國人」在身份認同上的差異，更明顯反映在他們對中國政府和香港政府的信任態度上。1997年前，無論「香港人」還是「中國人」，對香港政府的信任都在減退。1997年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度大幅提升，這種變化，應該是「非殖民地化」後，香港華人對回歸祖國懷抱比較正面的反應。「九七效應」明顯地對香港華人有一定的衝擊。在1997年的調查中，有48.6%的「中國人」對香港政府「很信任」或「信任」；而持這種看法的「香港人」只有30.1%。在1999-2001年，受訪者對香港政府的信任度仍在上升。「香港人」和「中國人」對香港政府信任度的比率相差正在擴大。這種看法上的分歧，不應單純地理解為受訪者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政策高度落實的看法，恰恰相反，我們應該注意到「香港人」對香港政府信任度「審慎」態度背後的擔憂。對「香港人」而言，政府是否能堅持「一國兩制」政策，不受大陸干預，仍有待觀察。因此他們對香港政府信任度的增加速度和幅度，沒有「中國人」那麼快速。

被訪者對政府的信任度雖然有落有起，但對中國政府的信任則「低位持

1990年，有29.3%的「香港人」計劃移民外國，而「中國人」則只有約15.4%，這麼高的比率，應該是「六四事件」的影響；到了2001年，有意移民的「香港人」只有9.4%，而「中國人」則為5.5%。「香港人」有意移民的比率較「中國人」為高，這與「香港人」對香港有較高歸屬感的結果相反。

「香港人」和「中國人」在身份認同上的差異，明顯反映在他們對中國政府和香港政府的信任態度上。在1997年的調查中，有48.6%的「中國人」對香港政府「很信任」或「信任」；而有這看法的「香港人」只有30.1%。到2001年，有54%的「中國人」信任中國政府，而「香港人」則只有26.1%。

續上升」。1990年，受訪者對中國政府的信任度十分低，6.3%的「香港人」表示「信任」或「很信任」，而「中國人」亦只有18.2%表示相似意見，這麼低的信任度，是1989年「六四事件」後的直接影響。對於香港華人而言，「六四事件」再次引發他們對中共政權的不信任和對前途的憂慮。俟後，受訪者對中國政府的信任度逐步提升。其中1995年因為港督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的「全面直選」事件，引來中英政治爭拗，香港華人對中國政府的信任度也因而下降。不過1995年過後，信任度再上升。到2001年，有54%的「中國人」信任中國政府，而「香港人」則有26.1%。與看待香港政府一樣，「香港人」和「中國人」對中國政府信任度的差異也有擴大迹象。1990年時，兩者對中國政府的信任，差別只有12%，到了2001年，比率擴大至28%，這樣大的差距，相信正是彼此身份認同上迥異的關鍵所在了。

調查發現與評論

在本文開首之時，為了方便討論，我們只對「中國人」和「香港人」作出簡單界定，但它們的真實意義和內涵，例如「香港人」的特質是甚麼？何謂「香港夢」？是高度敏感的經濟觸角，還是可以適應不同環境的能力？這些較深入的問題，我們並沒有觸及。其實，對這兩種身份的理解，向來都各有不同。就以「中國人」的身份理解為例，便各有各說，各持己見。生活在內地人的看法，和香港市民的看法便有不同；而香港市民與台灣人的理解又有差異；至於散居世界各地的華人，看法不同更加不用說了。

另一方面，我們同時注意到，無

論「中國人」或「香港人」，他們都不能避免地受到日漸強烈的「全球化」概念所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都會，又曾受英國統治，在視野和身份上已播下「國際性」的「種子」，較易對「全球化」的衝擊作出調適。至於中國內陸，自經濟改革以至2001年年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歷史性發展，不可避免地使「中國人」身份和文化，與西方其他文明發生碰撞和交流，這些發展肯定會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帶來劃時代的轉變²⁰。以上的論點牽涉層面甚廣，值得有興趣的學者深入研究。但這些並非本文的焦點所在，因此我們未予深入討論。

身份認同是個複雜概念，它「絕不是社會成員被動地接受某個身份的過程，而是個體主動地尋找一己社會行為意義，從而建構自己的身份」²¹。因此，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所代表的，不僅是他們在中國歷史文化影響下的認同或情感，還有其他因素諸如政治上的爭逐、經濟的追求和生活方式的選擇等概念。香港華人開始出現身份認同上的差異與含糊，自有其歷史發展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正是因為其歷史條件的獨特，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轉變才顯得趣味盎然。

我們在調查中發現，「九七效應」對香港華人身份認同發揮決定性的影響。無論是對香港的歸屬感，對政治經濟的狀況、政府工作和信任還是對未來的信心等各方面，均反映出1997年主權回歸的歷史性轉變，深深牽動着香港華人的心靈。在1997年，「香港人」更加明顯地表現出對香港的歸屬感，對香港的政治狀況也持相當正面的看法。相對而言，「中國人」對中國政府和特區政府的支持程度較大，對未來也寄予厚望，相信「明天會更好」。可以想像，在1997年，傳媒

天天為回歸作倒數，討論着駐軍、交接儀式、新政府運作等事宜，就算是普羅市民，日常談論的話題也離不開九七後的種種可能性，「香港的過去和未來」成為大家關注的中心。同時，中英雙方避開政治爭議，刻意營造「融洽、和平」的局面，經濟發展一片大好，香港瀰漫着樂觀氣氛。耳濡目染之下，香港華人很自然地受到感染。因此，對當時的局勢有「異常」的反應和看法，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也特別強，這種「九七效應」自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1998年發生了亞洲金融風暴，香港經濟泡沫爆破，香港華人對香港經濟狀況產生憂慮，再加上世界經濟不景氣，香港出現高失業、高通縮等情況，政府政策又未能對症下藥，香港華人開始為生計、工作而擔憂，對前景和未來的信心自然不停下降，歸屬感也跟着減低。往昔「香港人」身份所帶來的優越感開始動搖，這或者也是自認為「香港人」的比率愈來愈低的深層因由吧。

與此同時，與香港一衣帶水之隔的深圳，經濟發展欣欣向榮。中國大陸近年來經濟發展迅速，自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率便一直位於世界前列，短短十年間已發展成繼美國和日本後世界第三大國民生產總值最高的國家。在國際外交上亦取得重大進展，如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及取得2008年奧運主辦權等。中國在國際舞台的位置日重，與歐美諸國平起平坐，這些事實都牽動着香港華人的民族感情。雖然「六四事件」曾令香港人不安反感，但其後中國經濟的穩定發展及其外交成就，又令香港華人羨慕或自豪，身份認同上因而出現微妙的變化。九七回歸，中港兩地交流接觸日益頻密，香港華人加深了對中國大陸的了解，抗拒、隔閡也就慢慢減退。

以上各種因素，此消彼長或相互影響，導致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出現種種轉變。調查資料清楚顯示，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人數有日漸減少的趨勢，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比率則變化不大，而「兩者皆是」的，則逐步上升和強化。不過從三者比率上的差距看，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仍佔絕大比數，而認同「中國人」的身份趨勢，則有待觀察。至於「兩者皆是」的比率漸多的情況，就是十分明顯的了。出現這種現象，正好反映部分香港華人對「中國人」身份仍有一定的抗拒。相反，「兩者皆是」的身份較為含糊，但也較有「彈性」，因此較易為受訪者受落。最後，我們不禁會問：「香港人」的身份，最終會否被「中國人」或「兩者皆是」的身份所取代呢？從三者比率的巨大差距上看，這在現階段仍言之尚早，具體的發展，還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中國經濟的穩定發展及外交成就，令香港華人羨慕或自豪，身份認同上因而出現微妙變化。認同自己即是「香港人」，又是「中國人」的比率逐步上升和強化。因為這種身份較為含糊，也較有「彈性」，這反映部分香港華人對「中國人」身份仍有一定的抗拒。

註釋

① Gordon Mathews, "Heung-gongyahn: O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Hong Kong Identity",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9, no. 3 (1997): 3-13.

② David Faure, *Society,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③④ G. B. Endacott, *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Hong Kong, 1841-1962*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4).

④ 蕭國健：《香港的歷史與文物》（香港：明報出版社，1997）。

⑤ Ming-kwan Lee, "Hong Kong Identity—Past and Present", in *Hong Kong Economy and Society: Challenges in the New Era*, ed. Siu-lun Wong and Toyojiro Maruya

(Hong Kong: The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8), 153-75.

⑦ 林潔珍、廖柏偉：《移民與香港經濟》(香港：商務印書館，1998)。

⑧ Hong Kong Immigration Department, *Hong Kong Immigration Department 40th Anniversary Report*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2001).

⑨ 馬傑偉：《電視與文化認同》(香港：突破出版社，1996)，頁28-30。

⑩ 王宏志、李小良、陳清僑：《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台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吳俊雄：〈尋找香港本土意識〉，《明報月刊》，1998年3月號，頁23-27；蕭鳳霞：〈香港再造：文化認同與政治差異〉，載程美寶、趙雨樂編：《香港史研究論著選輯》(香港：香港公開大學出版社，1999)。

⑪ 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

⑫ Sai-wing Leung, "Social Construction of Hong Kong Identity: A Partial Account", in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1997*, ed. Siu-kai Lau, Ming-kwan Lee, Po-san Wan and Siu-lun Wong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9), 111-34.

⑬ Siu-kai Lau,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2)；劉兆佳：〈「香港人」或「中國人」：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 1985-1995〉，《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7年6月號，頁43-58。

⑭ 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台北：聯經出版社，1993)。

⑮ 同註⑬劉兆佳(1997)，頁43。

⑯ 王家英：《香港人的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一個自由主義的解釋》，*Occasional Paper*, no. 50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6).

⑰ Edwin Pak-Wah Leung, "Transition from De-ethnicization to Re-

ethnicization: The Re-emergence of Chinese Ethnic Identity and the Birth of a New Culture in Hong Kong Prior to 1997", in *Hong Kong in Transition* (Hong Kong: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1992), 594-603.

⑱ 同註⑬劉兆佳(1997)。

⑲ Victor Zheng, Kwok-keung Law and Siu-lun Wong, "From a Free Economy to an Interventionist Society: The Crisis of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in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1999*, ed. Siu-kai Lau, Ming-kwan Lee, Po-san Wan and Siu-lun Wong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1), 1-32.

⑳ Ronald Skeldon, "Emigration, Immigration and Fertility Decline: Demographic Integration or Disintegration", in *The Other Hong Kong Report: 1991*, ed. Yun-wing Sung and Ming-kwan Le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33-58.

㉑ Siu-lun Wong,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Identity", in *Emigration from Hong Kong: Tendencies and Impacts*, ed. Ronald Skeldo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72；同註⑬劉兆佳(1997)。

㉒ 參考「新世紀中國文化與全球化」專題，《明報月刊》，2002年5月號，頁19-31。內有劉再復、李澤厚、何兆武等的文章，對全球化的定位和衝擊有所分析。

㉓ 梁世榮：〈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理論與研究方法的反思〉，載劉兆佳等編：《華人社會的變貌：社會指標的分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頁190。

鄭宏泰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黃紹倫 牛津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